

岁月擦拭共沧桑 围林情牵垂后昆

——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在国立四川大学

□党跃武*

摘要 桂质柏(1900—1979年),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是1922年文华大学图书科首届毕业生,曾经担任东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图书馆的馆长(主任)。此文主要根据四川大学馆藏档案等文献资料,对桂质柏20世纪30年代在国立四川大学五年的图书馆管理实践和教育经历进行厘清和完善。

关键词 桂质柏 文华大学 国立四川大学 图书馆史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2.03.015

1 引言

桂质柏(1900—1979年),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是1922年文华大学图书科首届毕业生的“快乐六君子”之一;曾经担任东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图书馆的馆长(主任)^①。他完全称得上是一位可以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发展史上“前排就座”的图书馆事业家。

2 桂质柏与国立四川大学

在桂质柏的一生中,国立四川大学只是短暂的一瞬,却是其卓著不凡的图书馆管理实践中难以忘怀的五年,《国立四川大学民二五五年级毕业纪念刊》中桂质柏留影及其《国立四川大学教职员履历表(1939年7月)》如图1所示。从时间长短来看,仅次于他在国立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图书馆的经历。关于桂质柏的生平,其担任东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主任(馆长)的具体日期尚存在分歧。根据相关文献和档案资料,以及桂质柏之子桂裕民提供的相关聘书等实物资料,其任职日期分别为:东北大学,1931年6月至1932年7月;国立中央大学,1932年8月

至1935年6月;国立四川大学,1935年9月至1940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1940年8月至1956年5月;中国科学院武汉图书馆,1956年8月至1971年3月^[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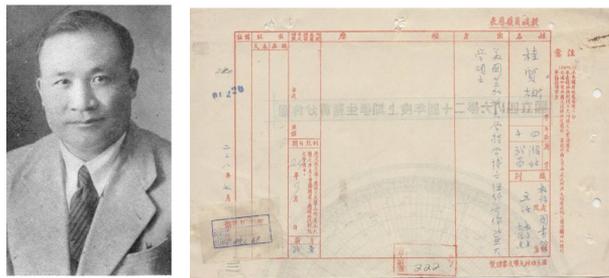


图1 桂质柏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留影及其《国立四川大学教职员履历表》

其中,桂质柏在国立四川大学的任职时间,根据多则档案材料可以确认。一则,四川大学馆藏档案中国立四川大学任鸿隽校长签发的聘书;二则,国立四川大学1940年12月3日据桂质柏11月29日由国立武汉大学来函要求开具的《服务证明书》,以及桂裕民提供张颐、程天放两任校长签发的聘书(与馆藏档案内容一致),如图2所示。

* 党跃武,ORCID:0000-0002-1759-6301,邮箱:dangyw@scu.edu.cn。

①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和文献均依据四川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馆藏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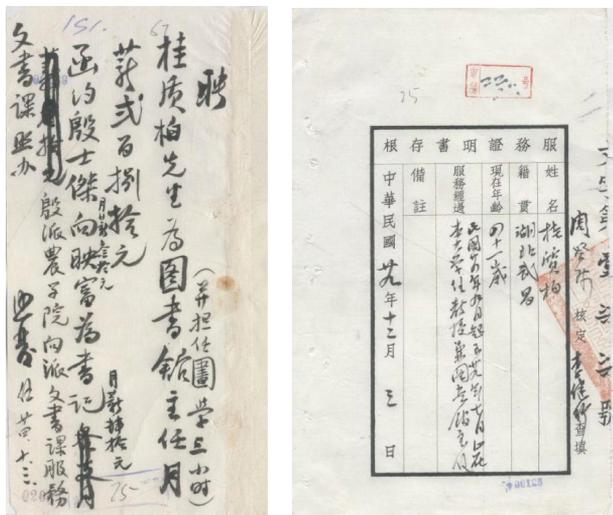


图2 国立四川大学任鸿隽校长签发的聘书(底稿)
和桂质柏《服务证明书(存根)》

桂质柏到国立四川大学任职并办理交接手续的具体时间为1935年9月,交接人为当时的图书馆代理主任曾广铭,10月21日任鸿隽校长正式签发聘书。曾广铭(1899—?),四川(现重庆)巴县人,1919年与聂荣臻等同行由上海赴法勤工俭学于蒙达尔纪(又译蒙塔日)公学(Collège de Montargis),后肄业于北平协合大学,1930年曾作为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代表出席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1935年受聘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外语系法文副教授,有《西康的宗教》等作品^[3]。

桂质柏离校任职并办理交接手续的具体时间为1940年7月,接收人为图书馆代理主任蒋白冈,1941年1月正式移交新任图书馆主任孙心磐。根据四川大学馆藏档案记载,蒋白冈(1904—?),四川成都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肄业,国立复旦大学心理学院毕业,曾任国立复旦大学图书馆馆员、上海天一影片厂剧务、重庆西南影片公司剧务主任,兼国立复旦大学心理、戏剧教员及其青年会图书馆事工、浙江大学图书课课员、山东省立剧院编辑兼教员等职务,1939年8月到校。孙心磐(1895—?),上海青浦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科毕业,历任国立东南大学、上海工商大学、国立复旦大学的图书馆主任,上海图书馆协会主要发起人,1940年8月到校。

根据四川大学馆藏档案,在校五年期间,桂质柏每月薪水均为280法币,属于教授中的中等水平。时任校长每月薪水均为600法币,秘书长、教务长、院长、系主任如曾天宇、魏时珍等和知名教授如徐中

舒等,每月薪水为400至320法币,一般教授每月薪水为320法币以下,特约教授等则按照课时计薪。在成都期间,他居住在陕西街观音巷凯庐。陕西街原名芙蓉街,后因陕西会馆而更名为陕西街。这条街曾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不醉无归小酒家”,取自《诗经》“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四川大学和川省各界尤其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喜欢在此一聚,朱光潜曾宴请何其芳和方敬等人,以撮合张充和与他招致国立四川大学的学生卞之琳。1942年4月23日,曾在国立四川大学城内部执教的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时仍返陕西街,雪舟招余与彬然、雨岩往‘小酒家’小吃,吃菜三色,值八十多元,亦太奢矣。”^[4]迁峨嵋山后,桂质柏寓居在圆通寺中。佛教术语“圆通”,意为不偏不倚,无阻无碍。圆通寺位于今峨眉山市北,相传为“仙者羽化之所”的四峨山,为明代高僧印宗禅师传人福仙所^[5]。

在校五年,除作为教育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之外,桂质柏一直任学校图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图书采购事宜、出版委员会委员、建筑委员会委员、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36年任文学院附设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导师,1937年任学校为防护日军轰炸而设立的防护团指挥,1938年任学校川军抗战史料搜集整理委员会委员、招生委员会监试人员,1939年任学校预算委员会委员、临时迁移委员会委员兼装备股副主任、抗敌后援会教职员会员执委。另外,在1936年4月18日至19日、1937年4月10日至11日举行的多次全校春季运动会中,他还担任田赛裁判长。根据《新新新闻》1936年4月19日报道:“川大昨日自午后二时起即开始竞赛,虽该校并未因开运动会而停课,然同学及少数外宾来参观者,仍有一千余人之多,情境至为欢跃热闹。内中尤教职员四百公尺竞赛一场,最饶风趣。计当时来参加竞走之诸人中,以图书馆主任桂质柏博士及庶务课主任刘维汉先生躯体极为肥硕。而又刘先生劝诱他人参加最为奋勇,但结果则第一属诸唐仲侯先生,而刘竟蹒跚其后,位居最末。”

1937年12月6日,作为学校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成员,桂质柏始终坚持爱国、坚持正义,与国立四川大学朱光潜、叶麀等70多位教授联名,为国民党反动派诬陷宣传抗日救亡进步人士的“康(乃尔)黄(宪章)事件”向校长张颐请愿。国立四川大学后专门印行《黄案始末记》一册,以示纪念。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各大学推行导师制,桂质柏受聘担任文学院导师。根据四川大学馆藏的多份学生注册类档案记载,他曾多次担任新生入校或贷款的担保人,其中基本上都是湖北同乡,如何光勋、夏世键等人。甚至在他离校赴任国立武汉大学之后依然如此,可见其十分看重师生之情、同乡之谊。

桂质柏执掌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期间,经历了任鸿隽、张颐 and 程天放三任校长。在1938年反对程天放掌校的“拒程”运动中,虽然桂质柏不是积极组织者,未在12月17日联名致教育部电即“拒程”宣言上签字,而在12月21日《四川大学教授启事》即“罢教声明”上签字,但又算任鸿隽和张颐的旧人,于是1940年暑假届满,桂质柏接到在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的聘书后,旋即离开国立四川大学。

3 桂质柏与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1935年任鸿隽执掌国立四川大学后,立即向全校师生明确提出——四川大学必须实现“现代化”和“国立化”两大目标,必须完成“输入世界的智识”“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担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三大使命,努力办成一所规模宏大、师资设备齐全、有国内第一流学术水平的综合大学。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1928年)和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1931年),桂质柏曾经在多个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的经历,任鸿隽立即聘任他为图书馆主任,四川各界同样对他寄予厚望^[6]。

关于桂质柏的博士学位,他获得的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图书馆中文图书的联合书目管理问题》(*Bibliographic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Incorporation of Chinese Books in American Libraries*)。他是美国第三位、中国第一位图书馆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国两位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和戴志骞先于他获得博士学位,但并非图书馆学专业。1925年,刘国钧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哲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意义问题》(*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and British Philosophy*)^[7];图书馆学家戴志骞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获得教育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论图书馆员职业教育:关于在爱荷华大学创办图书馆

学校的建议》(*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A Proposal for a Library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8]。

根据四川大学馆藏档案,《华西日报》1935年9月12日、17日和19日连续报道图书馆新任主任桂质柏有关新闻:“桂君为国内有数专家,前任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成绩丕着,兹因任校长一再电邀来川,担任今职,记者切盼其在筹划扩张中,予校外人将来以读书机会,则尤为幸也。”《新新新闻》1935年9月14日发表中央社消息:“川大图书馆聘定著名专家,桂质柏任主任。川大任鸿隽校长以该校图书馆亟待整理扩充,前会电聘著名专家,现任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桂质柏君担任川大图书馆主任,现已得桂君复电允任,并即日首途来蓉。按桂留学美专研图书馆学,得有博士学位,历任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职多年,成绩卓著,为国内图书馆界之巨擘,今应聘来川,对于川大图馆前途,必能予以长足发展云。”其后,又在10月19日指出:“川大图书馆,经图书专家桂质柏接办以来,运用科学方法,切实整理,该馆已将电灯装就,征集文献一切设施,大改旧观,闻下月内将拨洋七万余元,向外采购新书,以广珍藏云。”

3.1 在学校首开图书馆学课程

在桂质柏之前,公立四川大学和国立四川大学有陆德馨等开设目录学课程^[9],国立四川大学向宗鲁等开设过校雠学等课程,但是开设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学课程则是从桂质柏开始的。在东北大学期间,他兼任外国文学系教授。在国立武汉大学期间,他兼任文学院教授。1951年8月至1952年7月,他兼任武汉大学医学院英文教授。在国立四川大学期间,他是被明确作为文学院教育系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主讲图书馆学课程。后来的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主任毛坤在文学院开设目录学、图书馆学、中文图书编目等课程,文华图专毕业生、副馆长程永年也曾在文学院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就是继承了桂质柏开创的传统。

根据《民二十五年国立四川大学一览》《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各系级课程时间表》(1936至1937学年)等档案资料,桂质柏主讲的图书馆学课程,作为教育学系第二学年的选修课程,每周2小时,一学年共计4学分。1936年,桂质柏出版《图书馆学讲义》一书,曾有学者误为《图书馆学大纲》,实为他开设的



图书馆学课程的大纲,也可称为教材。全书共 68 页,主要包括“图书(馆)学之意义与范围”“图书馆分类法”“图书馆编目法”“参考书使用法”“图书选购法”“图书出纳法”“汉字排检问题”“图书馆之种类”“图书馆之创设”“图书馆建筑”“图书馆之组织”,共 11 个部分。

桂质柏主讲图书馆学课程,特点鲜明,尤以理论性与实用性兼备为要。一是目的明确。该课程涵盖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其目的和效果在于“为图书馆学理论及实施之初步研究”,使学生“能运用图书及图书馆之工具如目录期刊索引等”“能兼任或专任图书馆事务”“能指导他人使用图书馆”。桂质柏提出,图书馆学要“研究图书馆之组成管理与应用”“辅助各种学科之进行”,对图书馆四大要素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分别研究即成为各种专门学问。二是内容完备。桂质柏不仅详尽介绍最新图书馆技术方法和实务操作,而且对于古今中外图书馆学知识均有涉猎。例如,在教学内容中专设一节介绍 *American Catalog of Books, United States Catalog, Cumulative Book Index, Publishers Trade List Annual, Reference Catalog of Current Literature, Catalogue Général des Livres Imprimé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utscher Literatur-katalog* 等欧美国家书目,在教学实习中《杜威十进分类法》(*M.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和《国会分类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等国外图书分类法与中文分类法同时使用。三是要件完整。为达成教学目标,桂质柏特地设置教学实习环节,更加充分体现其应用型课程的特征,更多地强调面向图书馆专业管理和专业服务的教学理念。他开列本课程应用参考书,包括《分类大全》(桂质柏)、《图书馆管理学》(杜定友)、《图书馆学》(杨昭愬)、《图书馆组成与管理》(洪有丰)、《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王云五)、《中文图书编目规则》(桂质柏)、《中国图书编目法》(裘开明)、《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戴超)、《著者号码编制法》(杜定友)、《著者姓氏号码表》(桂质柏)等,为学生扩大知识面提供指引。四是反映实践。课程中有相当内容是桂质柏长期的图书馆经历,尤其是担任图书馆负责人的管理实践的总结和体现。在“图书馆建筑”一章中,“工程学专家与图书馆学专家会同拟定建筑方针与计划”,“建筑材料须防火患,

如水泥地板砖墙及钢书架”,“馆地之选择以闲静清爽交通便利为宜,建筑位置以空旷高燥为要,方向以东南为最合宜,南向次之,西南更次之,北向为不宜”,“建筑计划须坚固、须适用、须美观、须合卫生、须就各部事业之范围而计划、须先泛内部之配合,然后及于外部、须预计将来之发展”等要点,实为桂质柏经验之谈,且对图书馆建设极具指导性。

自桂质柏始,学校图书馆馆长开设专门图书馆学课程一度成为四川大学的教学传统,对学校图书馆学教育也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由于后来的图书馆馆长基本上都不是本专业出身,这样的教学传统因而也无法得以延续,此后图书馆面向学生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限于文献检索或读者教育领域。

3.2 科学拟定图书馆建设计划

1935 年的国立四川大学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踌躇满志的任鸿隽对国立四川大学的建设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他提出扩建大学的“永久的计划”和“临时的计划”,得到全校师生以及当时教育界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中,“永久的计划”即“长远的办法”,就是在成都市内的皇城主校区之外另择校址,重新布局,把学校办成一所规模宏大、名流荟萃、设备齐全、富有特色的第一流的综合大学。“临时的计划”即“眼前的办法”,则是对学校的师资、校舍、课程、图书仪器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立即动手改造,“图书设备仪器,增加的增加,改革的改革。”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拟定改建国立四川大学的宏伟计划,计划先建图书馆以应急需,分三年逐渐建设,最终改“皇城”为“学城”。在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筹备了 300 万元建筑费,其中 25 万元为图书馆建筑及设备费用,指定桂质柏负责拟定图书馆建设计划工作^[6]。賡即,桂质柏专门拟定《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建筑计划》并报任鸿隽校长和学校建筑委员会,全文如下。

学校图书馆之在供给师生之参考,大学图书馆乃专门各科之集合体。职责之重,未容忽视者也。试观东西各大学,对于图书馆无不竭力经营。诚以集最有用之图书、用最经济之方法供多数阅者之阅览。吾国现当训政时期,教育实为重要。四川大学系吾国西南最高学府之中心,方今国难日亟,外侮频仍,故充实本校设备为国储才实不容少懈。

本大学教育就仅受于教,本已也必有完善之



图书,庶足以资深造。以本校图书馆之狭隘、光线之不足、建筑之不适用,就特不足以养学子求知之欲。尤不能保藏固有之图书,遑论其他特殊之研究。事实上之需要,今已迫不及待,故建筑馆址实不能不彻底解决,爰以建筑计划如左,以供负责者之参考:

(一)新图书馆应能:一防火患;二实用,使于阅览管理二方面;三坚固;四经济;五美观;六地点适中;七易发展。

(二)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均一千人,且有每年增加之趋势,再加本城之阅览人士,阅览室之容量不宜过小,最低限度能容五百人。

(三)本校暂设四院,教员与学生应常相接近,俾收问难质疑之充分效果。图书馆且设教员、学生研究室,每院以二室为限。

(四)依二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统计,本校藏有中日文书籍九万余册、西文书籍五千余册,共约十万册。学校设备,除学术建筑外,自以图书为大宗。以后扩充定有相当之成绩,以一年添新书一万册,计五年内最少添五万册,故新书库应能容二十五万册者为合宜。

(五)现图书馆办公地点,布置星散,接洽不便,监督难周。新馆址须注意,本馆之暂设各股,一总务股,二采访股,三编目股,四阅览股,五期刊股,六装订股。妥为布置,时间既能节省,效率自可较增。

(六)建筑一完善之图书馆,必须应有各项设备,如卫生设备、灯光设备、暖气设备及适当之家俱。

(七)本校博物馆暂缺,但不可无。新馆址应划出相当地位,暂作博物馆之用。

(八)本校藏木版甚伙,对于全省文化实有莫大之关系,不得不设法储藏,以应目前之需。建新馆址时,亦宜注意及此。

凡此所举,仅及大端,其余不完不备之处仍多,尚待校长及建筑委员会各位委员之指教及协助,努力促成,国家之幸,亦学术之幸也。

桂质柏《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建筑计划》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完备性。全面把握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两方面的需要,既可以重点解决目前存在的空间狭隘、光线不足、建筑不适用等问题,也考虑了特色馆藏刻书雕版和博物馆建设等方面的需要。二是科学

性。充分考虑师生员工数量,还兼顾社会服务,科学设置阅览室,与现在的大学图书馆生均座位标准1:4大致相当。三是前瞻性。充分考虑教学科研需要,设置教师、学生研究室,以及确保必要的设备,尤其是提出暖气设备等方面,很具有超前性。四是持续性。充分考虑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图书的增加和服务对象的生长,预留较多的藏书空间和更大的服务空间。

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在皇城中并未修成,在峨眉时期修建的也仅是临时图书馆。当时的图书馆总馆设置在伏虎寺玉皇楼,新生图书馆设在鞠槽,师范学院图书馆设在报国寺,参考阅览室和期刊阅览室设在伏虎寺祖师楼,虽然面积还不够大,藏书不够丰富,但对于解决“上课讲义难,自修座位难,吃饭过时难,睡觉臭虫难,下雨道路难,晚上灯光难”作用还是比较突出的。在任鸿隽卸任前的1937年6月,由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领衔、关颂声等设计的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方在今天的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动工,在1943年国立四川大学迁返成都后正式投入使用。图3即为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建设合同。虽然此时的桂质柏已经离开了国立四川大学,但是作为当初图书馆建筑设计计划的主要参与者,他的功劳不可磨灭。

3.3 大量启用图书馆专业人士

在高校图书馆管理中,人员的重要性和专业性不言而喻。他曾经明确指出:“不同素质的人在图书馆相关岗位上业绩与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图书馆管理学工作之人,必须专业对口,要从单纯什么人都可干向专业对口上完备。”^[1]在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桂质柏正是这样广泛任用图书馆专业人才,并注意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其中,包括曾任职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的文华毕业生马盛楷以及文华图专毕业生程时学、徐世俊等,曾任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私立四川图书馆专门学校毕业生伊瑞棠,还有曾任职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蒋白冈、曾任职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的张汉樵和蔡报铎、曾任职安庆省立图书馆的曹纯、曾任职国立成都高师图书馆的罗辑熙等。事实上,在四川大学图书馆中,文华图专和后来的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学生一直是骨干力量,而且在四川大学(含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馆长中的文华图专毕业生就有毛坤、程时学(永年)、邓光禄、李永增等人。在国立四川大学工作的教职工中,著名的历史学家冯汉骥等也是文华图专的毕业生^[10]。



图3 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建设合同(1939年2月)

桂质柏本人既是图书馆学行家,又注重任用毕业于文华图专等校或曾经任职其他高校图书馆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因此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国内外图书馆界一时声名鹊起,特别在国内各图书馆学术期刊和协会会刊多有报道。

3.4 积极推进管理服务新发展

每到一处,桂质柏多撰写本馆简介,向国内外学界大力加以宣传推广。在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桂质柏专门编写《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概况》,分为中文版和中英文版两种,全面介绍图书馆的历史沿革、管理制度和业务规范。桂质柏沿用自己在国立中央大学、私立齐鲁大学等校制定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中外文分类编目方法和著者号码表等,还尝试性使用文华图专沈祖荣编译的《标题总录》编制主题目录。这些方法长期为四川大学延续使用,提升了图书馆管理服务的水平^[1,11]。在《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概况》(中英文版)中,有关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英文简介,酌加标题“Historical Sketch”“Renovating The Library”“Dynamic Organization”后,同时发表在1936年4月5日的《大陆报周刊》(The China Press Weekly)上。另外,在《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36年5月2日第76卷第9期304页,也刊发有此文。有关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英文介绍在两份近代有影响力的外文报刊上刊发,“走出去”的传播宣传价值尤大。沿此惯例,国立四川大学后来的几任馆长如孙心磐和程永年等均编写有关于图书馆概况一书或文章公开发表。桂质柏的《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概况(中文版)》见文后

附录。

除整理图书和加强业务管理之外,桂质柏积极推动法学院等学院建设阅览室并对外开放。在任职五年间,他亲自负责中外文图书采购工作,对于各学院推荐图书期刊的执行情况专门加以回复。在离职前,他在《本馆与国内外书店之现状》一文中,详细交代中外文图书采购情况,具体说明与国内外书店在采购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对于管理的细节,他也非常重视,例如专门确定复本政策,提出限制复本,购书以10本为限;翻印教材,数量30本起码。

如图4所示,国立四川大学主体南迁峨眉山后,桂质柏在积极寻觅办馆场所,扩充阅览室、添购书籍和添建书库的同时,优先充实教学所需的指定参考图书,比照学生人数确定每种应置的复本册数,以便学生参考而利教学。他还协同学校有关部门确定公布图书购置办法,增购专门学术书籍,便利教师开展研究工作。他组织各院系对于旧有的讲义进行认真的整理,并装订成册,存放在图书馆供学生查阅。

虽然经费极其短缺,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从1935年桂质柏到校时的不到10万册,不到两年即达到11.1万册。由于持续战乱和迁校的影响,在迁校峨眉的过程中,运送图书和档案的板车在山道上被抢劫,此后几年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增加较为缓慢,到他离校时也不过11.2万册。但是,学校极其珍贵的4万块刻书板片基本清点完成,为后来孙心磐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四川官书局等处雕版重刊为国立四川大学“抗战刻本”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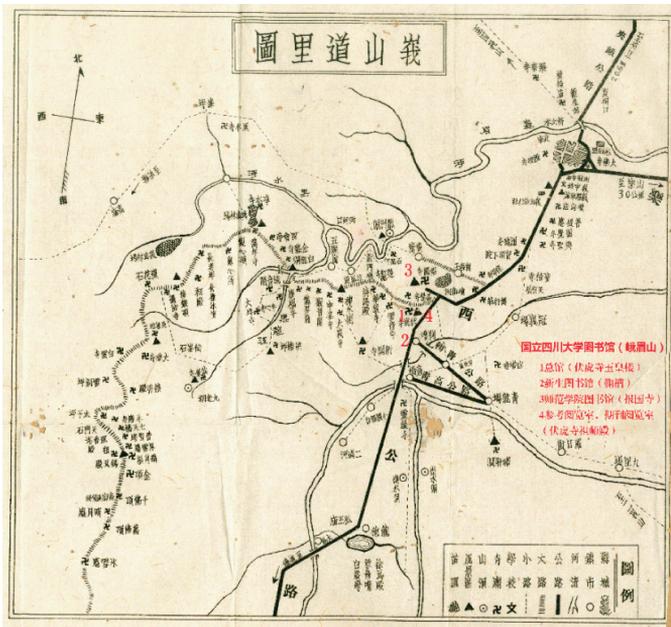


图4 峨眉山时期的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分布图

在国立四川大学期间,桂质柏曾专门出版有《大学图书馆使用法》(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1936年9月)一书。在书中,他首先强调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即“智识之源泉”“学问之渊府”,可“促成人群之进步”“增益社会之文明”。然后,他主要从目录、百科全书、字典、辞典、年鉴、期刊索引等6个方面介绍利用图书馆之方法。最后,他特别强调:“教育无止境,学问亦无止境。学生在校读书,如只受教育在课堂内所讲授之知识,则其所得有限,盖授课时间无多也。今日教育之趋势,教员除在课室教授,仍须指导学生课外之参考。”这些论述与今天我们在大学的本科教育中强调让学生适当增负,何其相似乃尔。

1935年12月19日,桂质柏先生在国立四川大学法学院演讲《怎样利用图书馆》,可以视其为《大学图书馆使用法》的简化版。该文在强调文献的文化贡献和图书馆的使命的基础上,从“熟习目录”“百科全书之使用”“字典辞典之用法”“索引之检查”“年鉴”“书籍之本身”等方面,说明图书馆的使用方法。他特别指出:“西人有言曰,‘图书馆为终身学校’,盖在学校中可以毕业,而在图书馆中则决无毕业之日也。”

在《新新新闻·每周增刊》1939年第23—24期发表的《大学毕业论文的作法》中,桂质柏主要从大学毕业论文的目的和毕业论文之构造两个方面加以论述。他特别强调大学毕业论文旨在增进思维能力、养成读书习惯和建立终身事业之基础,要从选题、拟定大纲、材料的蒐集与整理和论文之外形入手。在选题中,题目的范围宜狭小,要部分的,不要全体的;题目宜具体的,不要抽象的;题目要有吸引力,要新颖,有实际的价值;题目能激发研究的兴趣。

桂质柏重视图书馆教育职能,大力推动学校图书馆建设和服务,对于学校发展和学生成才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桂质柏执掌学校图书馆期间,正是国立四川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起步之时。理科研究所1938年成立,两年内发展到专任指导教师4人,研究生17人。最早理学研究所设化学部,分无机组、有机组、理论组和药学组。文科研究所成立于1940年,分史学、中国文学、语言文字学三组,研究生10余人。1941年11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学校设文科研究所和理科研究所作为研究生教育机构。科学研究素来以文献为本,学校图书馆为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峨眉山时期的国立四川大学,“简单朴

3.5 积极履行图书馆教育职能

桂质柏以图书馆管理实践见长,相关著述也主要集中在图书分类、图书编目和参考咨询等领域,除《图书馆学讲义》(1936年)、《中国图书经营法》(1932年)等通论型著作之外,其编著主要有《杜威书目十类法》(1925年)、《中文图书编目规则》(1933年)、《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概况》(1934年)、《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规则》(1935年)、《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分类大全》(1935年)等^[1,12]。作为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大力推广者,他从来都强调图书馆在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的作用。在《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36年9月7日第9版Hankow To Have Public Library Soon一文中,桂质柏提出:作为一个比学校范围更加广泛的社会机构,图书馆是一个城市教育计划的重要特征,因为它面向所有人群和各行各业。这种文化需求正被政界、产业界、教育界和其他人强烈地感觉到。在《学觚》1937年第2卷第4期发表的《设立四川省立图书馆之感言》一文中,桂质柏指出:“希望将来的四川省立图书馆,不是古代的一座藏经楼,乃是一种以科学及经济的方法,将一切有用的图书,搜罗整理,使社会人士均能自由阅览的一种机构。”因此,重视和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是桂质柏图书馆管理实践的精华所在。对于桂质柏来说,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就是践行其管理思想的重要试验田。



素的图书馆”成为学校师生在抗日救亡中勤于学习、追求新知的重要场所。虽然走进图书馆如同走进古庙，虽然期刊总是那么稀少，虽然读到的报纸永远是五天前的，虽然想看的书经常是“书已借出”或“此书已失”，但是，学校师生“永远不会忘记，是谁逼我们到这边野的角落里来。因为这，中国优秀的青年们，衷心蕴藏着无限的悲恨、愤怒之火，燃烧着我们整个的心灵，于是，他们把它发泻到学术研究上去。整日里图书馆中，便挤满了他们的足迹，为着抗战建国的需要，埋下了整个的心灵。”^[13]

由于缺乏对四川大学馆藏档案的系统整理，对于桂质柏在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实践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但是，桂质柏在国立四川大学五年难得的图书馆生涯必将成为其图书馆管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一定会在新时代高校图书馆建设发展中进一步发扬光大。

附：《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概况》(中文版)

成都为全蜀省会，南控藏卫，北通秦陇，西连青海，东望夔巫宁，为西陲重镇。并之全省疆宇辽阔，特产丰富，户口较盛，视他省或且倍从。凡本省及西南各省人士，现求高深教育此心，以成都为汇归，盖自然之趋势也。清末学制维新，成都即为黉舍荟萃之所。民国成立后有成都高等师范、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等设置，仍不足以副深研学术、发扬文化之使命，故复于民国廿年合并前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为国立四川大学。

本大学图书馆实汇合前成都大学图书馆、前公立四川大学之外国语专门学校图书馆及国学专门学校图书馆之藏而成此也。现总馆设于皇城旧贡院内，分馆设于南较场理学院及东门外农学院内。民国廿四年秋，任叔永先生来长本校，对于馆务，重事整顿内容，图书力图充实。此后发扬光大，端在吾人努力。用述最近概况如左，以资观感。

组织

本馆宜隶于本大学校长，设主任一人，以下暂设六股(一)总务股，(二)采访股，(三)编目股，(四)阅览股，(五)期刊股，(六)装订股，分掌各种工作。

藏书统计

照廿五年七月卅一日统计，本馆藏有中日文书籍十万零三千余册，西文书籍八千零三百六十余八

册。另有中文杂志一千二百四十七种，西文杂志二百余种，其陆续订购者不在此内。

分类

本馆图书分类，中日文书籍依本馆自编十进分类法，西文书籍则用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分类法。

目录

目录为图书馆之锁钥，亦读者之指南针也。本馆目录之形式分卡片式及书本式二种，随时增加，力求完善。

普通规则

第一条 本大学设图书馆蒐藏图书，以供全校师生之研究。

第二条 本馆依据本大学规程，设主任一人，秉承校长及秘书长之命，办理本大学图书事宜；设馆员若干人，辅佐主任分掌本馆事务。

第三条 本馆每日阅览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上午八时至下午九时，星期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如有特别事故，改定时间另行通告。

第四条 凡本大学教职员及校外各机关介绍之人员均得到本馆阅览。阅毕须将所阅图书交还，方得出外。

第五条 本馆借书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

第六条 本校教职员及学员欲借本馆书籍出外时，首次须先向出纳股依章填写借书证(学员须另缴本人二寸半身相片二张)凭证借书。欲借何书，再依式填写取书单。每次借书除教授外，职员及学生每人以二册为限。教授因特别参考，以二十册为限。如借书证遗失，须登本校校刊声明，并另缴大洋五角，方能照补。

第七条 下列书籍只在馆中阅览，不得借出：

- (一)普通参考书(字典、辞书)；
- (二)善本及贵重书籍；
- (三)教授指定参考书；
- (四)旧杂志。

第八条 凡本馆借出图书以二星期为限，期满后得续借二星期。

第九条 无论借阅何书，须经出纳处登录后，方可携出馆外。如未经正式手续而擅自携出馆外者，一经查出，当由学校重罚。

第十条 所有图书在借贷期内，如遇必要时，得



由本馆随时取回。

第十一条 借书期满不缴还本馆者,如逾期三日,停借书权一星期;如逾一星期,停借书权一学期;如逾一学期,下学期须将所借书籍缴还,方能注册。

第十二条 图书馆之书籍如有污毁、破坏、遗失等情,须照原价赔偿。

第十三条 在图书馆中,禁止交谈、欢笑、高声朗诵、吸烟、吐痰、食物及一切能损坏书籍或妨害阅者之行为。

第十四条 图书馆书库,教授随时可入内参考。其他未经主任许可者,不得入内,以免混乱书籍次序。

第十五条 本规则自公布日施行,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呈请校长修改之。

暂行办事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图书馆视事务之性质暂设左列六股。

第一股总务股,第二股采访股,第三股编目股,第四股阅览股,第五股期刊股,第六股装订股。

第二条 凡本馆职员处理事务应依本细则办理。

第三条 各职员对于所任职务及职务内所附有之事件均负完全责任。

第四条 各股事务有互相关系者,应彼此协商办理。遇有事务较繁时,得随时由主任指派他股职员帮同办理。

第五条 本馆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但有特殊情形者,另定之。

第六条 本馆职员按照本馆办公时间每日在考勤簿上签到。

第七条 各职员因特别事故或因疾病请假,须遵照本校职员请假规则办理。

第八条 图书馆章程、布告、函件,有关于各股进行者,该股须随时留意执行。

第二章 总务股

第九条 图书馆主任除总理图书馆一切事务外,为总务股当然股长。

第十条 总务股负责文件之起草及收发。凡对外文件,均须由主任盖章方得发出,并将所拟底稿、

所收原件分别保存,以便检查。其无关紧要者,限逾一年即行销毁。

第十一条 本股每早八时检阅各股工作报告,并须向各股征集各项统计,编制图表以便参考。

第十二条 本馆应用物品及器具应随时检查,酌量增减。

第十三条 每学年度应审查全馆情形,编制各项预算及决算。

第十四条 督促全馆之法洁及属于馆舍等地之布置。

第十五条 来宾参观由本股招待。遇工务忙时,得请他股或学校职员帮同办理。

第三章 采访股

第十六条 凡各院系应用图书,由各院系教授斟酌预算开单,交各院院长转送本股登记订购。

第十七条 介绍单交本股时,应查明著者姓名、书名、出版处、出版期、定价及馆内已有之部数,为系复本或能交换或赠送者无须购买。

第十八条 凡为急需之书或为经费所限未能立即订购者,均在缓购之列。

第十九条 应购之书经校长批准后方得发出。

第二十条 购书方法应以价廉及时间经济为原则。

第二十一条 新购图书送达馆中时,如版次、册数、面数、价格均无误后,即将正式发票点核清楚,送交会计课付款。如遇有书籍倒装、损坏等情,即送回换掉。

第二十二条 如添购新书须预付款项时,本股得请本馆主任凭件负责向会计课预支。每年终了,总核算一次。

第二十三条 书籍收到后,如无其他问题即送至编目股编目。

第四章 编目股

第二十四条 编目股除杂志、小册子外,管理全馆图书之分类及编目一切事宜。

第二十五条 编目股为便利办事起见,分中西二组办理下列事项:(一)登记;(二)分类;(三)编目;(四)送书;(五)新收报告。其详细办法另定之。

第五章 阅览股

第二十六条 阅览股暂分(一)参考组;(二)阅览组;(三)出纳组;(四)典藏组。其执掌事项分别如左。



第廿七条 参考组解答阅者关于学术上之问题,指导阅者关于图书馆及参考书之使用方法,搜集各种重要时事新闻以备阅者之急需。

第廿八条 阅览组指导阅者之阅览,维持阅览室秩序,检查书架上各书之地位,注意阅览室中之布置与清洁卫生等事项。

第廿九条 出纳组根据借书规则办理本馆借书还书事项,其详细办法另定之。

第三十条 典藏组整理及保管一切藏书。各书须照书码插架并应随时,察阅架上之排列有无错误、书标有无损坏,点查应修理或应撤消之图书。

第六章 期刊股

第卅一条 期刊股应登记编制及陈列各种杂志、报章并办理添补新旧杂志、报章等事项。

第卅二条 凡有新出之期刊足备本校参考者,须随时报告主任转告各院酌核备置。

第卅三条 应订购及保存之杂志、报章须酌量情形,装订成册,以便存查。

第七章 装订股

第卅四条 凡修补装订之图书,概交装订股办理之。

第卅五条 未装订前,先点核内容,查明格式,注明书脊及书面上应有之事项。

第卅六条 本细则由校长核定施行。如有未尽事宜,得由主任呈请校长酌核修改之。

参考文献

1 刘峻明,桂裕民.中国图书馆学博士第一人:桂质柏先生[J].图书

- 情报知识,2009(6):115-118.
- 2 田芳.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群体的职业精神之探讨:以曾供职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学家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34(6):116-121.
 - 3 吴湘湘.民国史料丛刊第二种: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始末记[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131-203,282-393.
 - 4 姚锡伦.成都老街记忆[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7:252-256.
 - 5 乐山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乐山掌故: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238-239.
 - 6 党跃武.四川大学校长传略[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86-105.
 - 7 郑锦怀.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136-137.
 - 8 Luo Y.The Genesis of youth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1912-1937[D].Urbana,Illinois: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2015:121.
 - 9 陆原.清霜淡月战秋风:简记伯父陆德馨[J].文史杂志,2007(3):13-14.
 - 10 廖洛纲.文华图专毕业生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对四川地区各图书馆做出的贡献[J].图书情报知识,2009(6):110-111.
 - 11 齐君.论桂质柏图书馆学思想的构建:以其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3):119-124.
 - 12 白国应.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先生[J].图书情报论坛,2001(4):63-65.
 - 13 党跃武.四川大学史话[N].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205-210.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教务处、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收稿日期:2021年9月22日

修回日期:2021年11月5日

(责任编辑:支娟)

Ph.D Chih-Ber Kwei in National Szechuen University Library

Dang Yuewu

Abstract: Chih-Ber Kwei(1900-1979), the first doctor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was the first graduate of the Library Science Department of Wenhua University in 1922. He had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such as Northeast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ational Sichua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and the Wuhan Libra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ased on the archiv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clarifies and completes some facts of the library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Ph.D Chih-Ber Kwei in the 1930s.

Keywords: Chih-Ber Kwei; Boone University; National Szechuen University; Library History